



陶飞亚 主编

中国知识精英 外交思想研究

——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

罗 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丛书



陶飞亚 主编

中国知识精英 外交思想研究

——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罗珍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5

（“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丛书，陶飞亚主编）

ISBN 978-7-81118-595-9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37~1945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788 号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责任编辑 李 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丛书

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

——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

罗 珍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9 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ISBN 978-7-81118-595-9/D·110 定价：60.00 元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Supported by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of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Project
Number: J50106

【摘要】

知识精英是在思想、组织上与政治党派保持一定距离的民间文化人士。他们关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主张,呈现着国民或民间的思想状态,不仅具有前瞻性,同样具有理性思考的特征。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及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考虑到知识精英的职业特点及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对公众、国家层面的影响,笔者将研究的对象指向史学界、由学入政者(指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职业报人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几个不同的层面。希望通过对不同层面诸个案外交主张的详细研究,显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成熟起来、走向世界的历程。借此彰显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他们所提出的外交主张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中国人外交观念因救亡而嬗变的情况;呈现知识精英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谱写的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诗篇。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思想,呈现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特征、状态,总结其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亦同样具有现实价值,对于当今国家外交战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烈恢宏的历史篇章,无数爱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奉献了他们最珍贵的青春、智慧和生命。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他在抗战时期,不仅撰写了多篇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的文章,还奋笔书下大量抗战形势分析文章,指出黑暗中黎明的必然到来,倾抒心臆以振奋民心,他还甚至亲自参加组织像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样的抗战干部学校,直接为抗日前线培养和输送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而像这样的史学家、学术工作者、知识分子,环顾当时的烽火大地,可歌可泣者,实在枚不胜数。尽管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职业岗位甚或不同的营垒。真正爱国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抗日和民族独立的大旗下聚集,倾尽心力奉献他们的热血、智慧和才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国共合作、全国民众共同浴血奋斗的胜利。诚然,研究这样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原因,可以考虑的问题和因素还有许多,包括像抗战外交、抗战外交思想等这样十分具体的问题。抗战伊始,中国人的外交观念、外交思想就一直持续着重大的变化。来自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领域的爱国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对不同时期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抗战出路的探索,强烈折射出他们的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理念和渴望,他们的诸多合理建议对中

国抗战事业、争取国际社会同情、携手共同御敌、走向全面胜利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学者所评论的：“抗战时期外交的胜利，不仅属于这一时期，而且属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属于这百年来种种为争取中国应有国际地位的努力。”（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罗珍博士所著《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以抗战时期为考察中心》，对此相关问题作了专门探讨，其中所涉及的一些话题是以前关注不多的，使我们从一个新视角去关注影响抗战胜利的若干重要因素，启开这方面研究的新窗口。据我所知，为了这一研究，罗珍博士付出了很大心血，尤其是资料的采集，可谓不分昼夜。而這些，对一个母亲又多么不易。衷心祝贺罗珍博士在学术道路上的这一不易成果，并期望她百尺竿头、更高一层，有更好、更新的成果！是为序。

朱政惠

2010年2月14日

Contents

导论 / 1

- 一、问题的提出 / 1
-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 8
-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11
- 四、相关的学术研究回顾 / 17

第一章 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政论的大量涌现 / 22

- 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概念之厘清 / 23
- 二、抗战时期“政论”大量涌现的政治因素 / 29
 - (一) 动荡的政治环境 / 29
 - (二) 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 30
- 三、抗战时期政论大量出现的文化因素 / 32
 - (一) 史书是学者评述时政的主要载体 / 32
 - (二) 中外交流的扩大,为知识分子的议政参政提供了一个“他者”的参照 / 34
 - (三) 清末民初以来以报刊为载体的政论对社会影响的激励 / 36

第二章 20 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活动及外交观 / 40

- 一、从被逼签城下之盟到愤而反抗 / 41
- 二、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 / 43
- 三、以史论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47
- 四、中国史家外交史观解析 / 53

五、结论 / 54

第三章 1930 年代中国史家的外交史观研究 / 55

- 一、“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人外交观的影响 / 55
- 二、关注中国命运的近代史研究 / 56
- 三、以史论政的若干思考 / 70
- 四、结论 / 77

第四章 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以胡适、蒋廷黻为考察对象 / 80

- 一、胡适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 81
 - (一) 胡适外交主张的提出 / 82
 - (二) 胡适的外交主张 / 85
 - (三) 胡适的外交实践 / 103
 - (四) 结论 / 124
- 二、蒋廷黻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 128
 - (一) 蒋廷黻外交主张的提出 / 129
 - (二) 蒋廷黻的外交主张 / 131
 - (三) 《中国近代史大纲》中的外交观 / 146
 - (四) 蒋廷黻的外交实践 / 153
 - (五) 结论 / 158

第五章 媒体人的外交思想

——以《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为考察对象 / 159

- 一、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 161
 - (一) 张季鸾外交主张的提出 / 163
 - (二) 张季鸾的外交主张 / 165
 - (三) 结论 / 185
- 二、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 188
 - (一) 王芸生外交主张的提出 / 189

(二) 王芸生的外交主张 / 191

(三) 结论 / 217

第六章 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 219

一、顾维钧外交主张的提出 / 219

二、顾维钧的外交主张 / 221

三、结论 / 235

第七章 对相关问题的诠释 / 236

一、为什么标榜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选择支持国民政府? / 236

二、他们对国际关系情势嬗变的分析判断是否具有前瞻性? / 246

三、胡适等的“主和”主张与汪精卫等“主和”主张的性质有何
不同? / 259

四、关于国民外交与外交公开问题 / 273

结语 / 279

参考文献 / 286

后记 / 299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一战争,不仅扭转了此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被动挨打局面,而且还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中国这一国际地位的获得,可以说是与中国成功地制定与实施了适时的外交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战时外交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大多集中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后来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外交行动及思想上。从战时外交总的研究情况看,基本上都肯定了当时国共两党外交思想、外交政策或活动对中国抗战成功的贡献。^① 国共两党战时外交的研

① 学者称抗战时期的外交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最充分的一部分”。“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学者认为,‘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的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国民政府期待的‘变’是指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从而加速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形成,使孤军奋战的中国获得强大的同盟军”。但王健朗特别指出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欧战爆发后,中国对欧洲局势的外交因应,意义重大,但除各别著作稍有论述外,绝大部分甚少涉及,也缺少研究专题。因资料缺少的关系,他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多少有些猜测的成分在内。认为:按照一般研究者得出的结论,1939年欧战爆发后,欧战应该为国民政府所欢迎,因为它加速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中国争取民主阵营的援助有利;但仔细研究发现,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在欧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并不像其后来所说的那样,期盼世界战争的发生;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此后国民政府谨慎应对,并力图因势利导。(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1期)国民政府在抗战发生后的外交观念是争取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的力量共同抗战,这些力量包括除侵略者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外对内国策,放弃了之前的废约运动,转而将中日冲突问题诉诸国联解决。同时以国联为依托,与各国开展了技术合作,全力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在此期间对日本的进逼取步步忍让的策略,以培养国力。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一文中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最为了解,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忍耐并默默积极地从事御侮雪耻的准备工作。“九一八”以后的局面,已形成日本独霸东亚之势,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即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转下页)

究,丰富了抗战史、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但是,仔细分析研究成果发现,

(接上页)将于三年之内爆发”,国人应利用这宝贵时间,“开拓出一条生路”。中国六年的奋斗,走上复兴自强之路,有这六年的建设,才奠定了我们八年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坚固基础。((《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以“苦撑待变”的国策坚持抗战,同时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经济上、道义上的援助,同时积极的促进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制止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此后又与美英苏等国一起,共同发起并积极地促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与秩序的组织——联合国的成立。由此观之,国民政府的外交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国际政局、国内政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野党,处于国民政府围追堵截的环境中,但依然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冲突予以密切的关注,发表自己的主张与建议,积极地行动起来。在1949年10月以后,共产党成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所以研究、考察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及国际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中能看出中共在战后及其执政后外交政策的原则及走向。故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交问题自然的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其成果丰厚。除“相关的学术研究回顾”中所列的专著外,在党史、现代史的教科书中也有不小的篇幅述及,此外尚有大量的论文。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共产党战时外交的学者,均认为在“九一八”事变至二战结束,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因国际政局的演变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观念的变化反应了共产党融入世界的进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本来只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国共产党外交观念的转变是与国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外交策略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在“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间,中国共产党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七七”事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利用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打击日本,中共和外部的联系多起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失败,苏联重新解释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已经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战争。据此,中共的战略也做出了重大修改。1941年7月7日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决定联合英美,改变了由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1941年12月8日,发表《中共为太平洋战争宣言》,12月9日发出党内指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认为“值此国际形势变化之机,从内政至外交”的政策都要改变,以适应目前形势。所以拥护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主张与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认为英美等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共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表示,从中共的外交观念上讲已经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的发生了改变,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出中国、共产国际圈子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重大步骤”。(王桂林:《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1期)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也指出:苏联的国际战略或对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对外关系的论述,表述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加强与世界联系,赞同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的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已经融入世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观念与“九一八”之前的不同,有学者指出:抗战前的中国外交,专注于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国际事务,无力顾及也无发言权。在存亡绝续的民族危机面前,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和动力之下,中国的外交方针、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积极性、主动性大为增强。但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否称得上革命,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但产生了新思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变化是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大事,(转下页)

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当时有相当影响的所谓中间势力或中间派别^①的外交主张及建议却研究不多。鉴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及身份特殊,为国共两党同时争夺的对象。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中间势力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问题,并将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1941年时就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②因此中间势力“能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或影响”,^③同样,他们当中的知识精英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自然也对中国当政者外交政策的制定、对国民外交观念的形成、演变产生影响,他们的外交主张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所以,本文旨在研究抗战时期所谓的“中间势力”中的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探讨其在外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所提出的外交主张及特色,希望能借此研究,彰显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经抗战而成熟、完善、最终走向世界的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威逼与凌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天朝大国的地位及

(接上页)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大事。(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① 中间势力或派别包括当时一些国共两党之外的小党派,亦包括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因所办刊物之名而被冠以某派,如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对于这些人物,近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将他们称为“第三种力量”。闻黎明在《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一书的《绪论》中说:“在国共两级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其间“生存着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离的集团、群体,以及为数众多的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与自由主义分子,其中也包含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分子。它们虽然游离于主流势力之外,却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实际和潜在作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走向。”“对于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目前史学界习惯称之为‘中间势力’或‘中间力量’。不过,这些名词都是在特定的国共斗争环境下使用,但它们有些活动并非与国共斗争绝对相关,鉴于本书将这些对象纳入研究范畴,故而使用了目前还未被正式引入史学用语却具有政治属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特定名词。”(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②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4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

③ 韩泰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派别的产生及其基本主张》,载王淇主编:《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第9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关于中间派别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另可参见同书所载的沙健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王沛:《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研究 一

观念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的逼迫下一落千丈。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次失败,使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有识者开始关注外交事务、世界情势的演变情况。从道光、咸丰年间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关注中外关系及西方世界的情况、并就此著书立说,以图资政。^① 进入二十世纪后,鉴于中外关系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逐渐觉醒的中国人开始关心国家的对外关系,在一系列的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外交事件中,逐渐扮演着监督政府、观察国内外的形势、造成有相当倾向性外交舆论或行动、影响政府的外交活动或为政府外交行动后盾的重要角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外交。^②

- ① 他们当中较有影响的有魏源写的《圣武记》、《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及《粤海关志》,夏燮著的《中西记事》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由于魏源与林则徐个人关系密切,所以他写的书史实较详细,若从学术成就上讲魏源是比较好的;但即使如此,他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所记史实错误仍不少,蒋廷黻曾评价说:“我们不要忘记魏默深也是时代的产物。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虽然默深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他们的历史哲学仍旧是千余年前的传统见解;‘褒贬善恶’、‘资治借鉴’。”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面屡屡说明‘洋事转机’,而史实的叙述却有许多很可笑错误。”(蒋廷黻: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蒋序》。文通书局,1942年)几十年后,有学者专门著书予以纠正,这就是姚薇元在1933年所著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从考证的结果看,即使如魏源这样的学者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说明,由于时代的限制,虽然学者欲总结中外关系过程中中国何以失败的原因,以供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借鉴,但以魏源等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的程度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政府的贡献是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何以会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始终处于劣势、且变得愈加贫弱。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经历多次失败的中国人,逐渐地意识到仅仅靠拒绝与西方的接触,中国是不会避免被欺凌的地位。于是他们以自己所了解到的西方强大、中国贫弱失败的条件,开始了自强之路——洋务运动。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自强的彻底失败,而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昭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总失败。不仅中国的百姓直接品尝到了外交失败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恶果,清政府最终成了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清王朝的垮台。
- ② 梁启超说:“现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国民外交。所谓国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利害为前提也。……当此国民外交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则在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见《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第163、166页)1930年代出版的《外交大辞典》将“国民外交”定义定义为:“国民外交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一致,是谓之为国民外交。”这是不同于以前的秘密外交而言。“论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其实不然。”国际间实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舆论——依国民之良知良能,批评外交之当否;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二)限制外交权——如关于国家之重大外交事件(宣战、媾和、缔约、领土主权之变更等),常依宪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然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三)设置常设外交委员会——以备政府之咨询,或审查政府之案件。(四)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瑞士国一九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十九条均大致规定,举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须国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五)国际上之限制——如联盟规约第十八条,凡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积极防止秘密条约,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也。”(外交学会编:《外交大辞典》,第73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

民国成立后,尤其是巴黎和会之后,国民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日益增强。^①此后,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或策略时,一般而言是考虑或注意国民的外交舆情或外交行动的价值取向,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策略必然反映这一时期国民的外交意向。尤其是在面临外敌入侵、国族危亡,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时更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人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以何种思想处理外交问题,就成为攸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抗战时期的中国,从政府到国民(不同层面)均对中日关系问题表示了极其严重的关注。为解决中日间的冲突问题,政府及各党派、不同的团体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就此相关的该如何与世界各国保持何种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提出这些主张、建议的宗旨,均是为该如何解决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何看待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制定我们的外交策略、如何争取与联合世界各国同情中国的力量共同击溃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当然,因所处的地位不同、及所信奉的理论观念不同、对世界局势认识与了解的程度不同,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影响及实际作用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故唯有对不同集团、党派、阶层人员的外交思想予以分别、具体的、历时性的研究,才能彰显中国人外交观念因中外政局的变化及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增多而渐趋一致的现象、对外交事件的解决的主张渐趋理性与成熟的历程。只有了解了在外敌入侵背景下中国人外交观念变化

①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举动,可以说是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北京政府又开展了与列强各国的修约运动,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开始了中国主动的要求与帝国主义国家修改或解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过程。与此同时及稍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诚如时人所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不仅要消灭封建势力,同时更要排除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此种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应在外交方面”,是“态度强硬,主张激烈”。(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仍以取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为中心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及争取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为主。由此可见这时的外交观是以中国为考虑中心,套用现下的流行用语就是一“中国中心观”在办外交。以为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就会在国际社会与列强处于平等地位,没有注意到应将世界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与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互动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尤其是没有考虑到睦邻友好问题,反而与周边的苏俄因中东路问题搞得很紧张,也没有注意到日本对东北的觊觎。

的历程,才能更充分的彰显当时不同党派、团体、阶层的人何以能团结起来,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去;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地评价中国抗战成功的原因;并能对当时中国人外交观对争取抗战的胜利作用及与之前的外交观念的异同、抗战后期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外交问题的设想作出一个理性的评估。

从目前所看到的有关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问题的著作、论文中可见,绝大部分是研究国共两党及其政权的外交思想、活动,有极少部分涉及到了国民外交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的研究,但对于造成或引导国内外交舆情、国民外交的实践者的知识精英在抗战时期提出的外交思想的研究还是相当欠缺的,似乎成为战时外交研究的盲点。这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战时外交成功原因评价的欠缺。因为中国战时外交成功因素很多: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政府制定的适时的外交策略及依此进行的外交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外交上制定何种政策及该作何种努力要依赖于人们对中日关系演变情况、国际情势的嬗变情况、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调整情况的认识程度。

当时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国际情势的演变情况的认识与了解,主要依据专家、学者、报人等的研究报道及职业外交官所提供的情报信息。所以他们对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及世界各国历史及对外政策进行的研究,以及以此为依据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外交问题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据或参考。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不断地找专家学者谈话,并向他们征求关于中日冲突问题的意见情况看,知识精英关于国际事务的知识、研究的结果,会对蒋介石决定的外交政策产生某种影响。至于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或决策过程中采纳了他们的主张或建议的哪一部分,由于材料的欠缺,尚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①从蒋介石对学者、舆情的重视,及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入政府工作的情况看,他们的研究及外交主张被政府制

① 这可以从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及研究人员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与知识界的密切接触中可见一斑。“七七”事变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极高,国民党内主战的势力渐占上风,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进一步听取民众的意见,国民政府决定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共商国是,被邀者200余人。张季鸾、王芸生、胡适等均参加了谈话会,具体的内容参见贺伟:《〈庐山谈话会〉及〈抗战宣言〉发表始末》,载《档案春秋》2007年7期。

定外交政策或策略时参考或采纳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同时政府不时地向驻外使馆人员征询所在国家的情况及相关的国际情势等也证明了政府对外交官员主张与建议的重视。当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完全掌控在蒋介石手中^①,这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记载。如坚守上海的决定就是顾维钧等向蒋介石建议并经蒋介石说服其他官员而决定下来的,他得出结论,由于体制模糊不清及决策权的不明确,“总是由蒋委员长一个人来左右局势。”^②

知识精英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见解一方面通过他们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经政府的组织系统上达政府高层而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在制定政策时予以借鉴;另一方面以他们所掌握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报刊、及他们所写的书为载体,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人、影响着国民的外交舆情及行动。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与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对外交问题的研究与主张密不可分的。知识精英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够,本文之所以选择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精英外交思想进行研究,其目的就是弥补战时外交问题研究中在这方面的不足。

关于抗日战争的起讫时间,学术界通常认为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前后八年,一般称“八年抗战”。本文把抗日战争的上限延伸到1931年,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其定性为地方性事件,指令地方政府及国民不许扩大事态。但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在中国扩张势力的计划,而是从经济入手一步步地实施他们侵占中国的计划、同时不断地在华北制造事端,在政治上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权利,当他们认为准备很充分后,就挑起“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不少学者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就认定此次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在性质上是相同

① 这可以从杨天石关于抗战时期的中日间秘密谈判的系列研究论文中得到证实。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载《历史研究》2006年5期;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2期。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680、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